

大学信息的来源、水平及效用： 基于华东地区“县中”学生的实地考察

◆汪卫平 吴秋翔 郑雅君

摘要：大学信息能助力高三学生尤其是学业优胜者应对复杂多元的大学录取过程。既有研究不仅在概念界定上缺乏严格区分，也缺少中国情境下的系统考察。本研究基于整合后的大学信息概念框架，对华东地区多地的大-高中-家庭-学生多主体进行联合考察，试图了解学生的大学信息掌握水平、来源渠道以及效用。研究发现，大学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是社交新闻媒体和老师同学、亲朋好友。低收入家庭更依赖以学校官方网站或资料与社交新闻媒体为代表的弱关系，高收入家庭更依赖老师和同学、父母教育、亲朋好友等强关系。学生的大学选择更看重专业、就业、教师水平等激励信息。学生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对招录过程的特殊招生政策、奖助学金等信息知晓水平相对较差。大学信息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关键认知能力和期望水平，但这种影响在城镇学生身上更为明显。信息还作为一种积极的准备行为和心理对后续大学适应和参与产生影响。

关键词：大学信息；信息来源；“县中”学生；强-弱关系；新高考改革

DOI:10.14121/j.cnki.1008-3855.2023.01.016

一、引言

法国社会家迪迪埃·埃里蓬在《回归故里》中谈到“我在学业上的选择也带着弱势阶级的印记，对于应该选择哪些方向，我们完全不了解必要的相关信息。我们没有任何选择优等学科的策略，我选择的是文科，而实际上理科才是更好的选择。”^[1]相较于传统的升学考试，当代大学多元录取机制似乎进一步加剧了阶层高等教育分化。^[2]虽然中国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大学招生录取制度有明显区别，然而随着新高考制度的改革推进，中国的大学申请也趋向复杂、自主、市场介入等国外特点。新高考改革强化了学生及家庭的选择权，但学生选择权的扩大并没有伴随其准备能力的提升。大学选择模型(college choice model)^[3]认为学生的选择包括倾向生成、信息搜索、做出决策等三阶段。从理性选择假设来看，多元化录取政策会进一步凸显学校和专业等信息在个

体决策时的重要性。这也与“知沟理论”(Knowledge Gap Theory)的传播信息越多越会加剧信息的阶层鸿沟的观点以及坊间盛传的“七分考三分填”相吻合。因此，是否以及更好掌握相关大学信息对于多元录取背景下的大学备考至关重要。

虽然市场化的大学信息咨询和辅导机构的参与丰富了信息来源渠道，^[4]但是鱼龙混杂的信息质量和内容有可能进一步混淆真实的信息质量，尤其是对于本就处于信息劣势的低阶层而言更可谓是雪上加霜。看似客观的大学排行榜也并不会推动大学信息分布的平民化。^[5]笔者在天眼查上搜索“志愿填报”结果，共显示接近2800多家小规模且非常年轻的公司涉足该产业。这不得不让教育部在高考期间紧急发布了对“高考志愿填报陷阱”的预警，点明部分机构“信息提供不准确”。此外，大学内部的学习生活所蕴含的隐性知识(“打怪策略”“通关秘籍”)也扮演着重要的信息角色。虽然信息解码能力同样重

汪卫平/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杭州 311121） 吴秋翔/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100872） 郑雅君/香港大学教育学院 博士研究生

要,但是对于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则是基础性的任务。

然而遗憾的是,国内目前鲜有研究对大学信息的系统考察部分实际涉及的研究散落也在资助信息、^[6]升学生涯规划指导^[7]等相关议题。随着新高考改革政策在全国范围推广,在高中-大学衔接以及县中教育生态^[8]引发的教育部“县中提升计划”综合推进背景下,本研究基于长期与多点的设计逻辑对华东地区县中学生进行混合研究,了解高三学生对大学信息的认知与掌握程度及其实际效果,并着重于考察阶层之间的差异,试图为大学信息的理论系统化、中学-大学衔接体系建设,以及提升弱势学生大学准备的政策实践提供实证依据。

二、文献回顾

(一)大学信息的概念、维度及应用

大学信息指学生能够了解与大学相关的知识或信息内容,这些内容包括复杂的大学录取和选拔过程(例如计划与注册),可用于帮助支付大学费用的策略,能够适应大学阶段学业水平的知识要求,以及中学和大学的文化差异。学生和院校都需了解与消费者选择类似的大学决策过程。学生通过大学网站、目录和小册子、校园参观和大学宣讲会、咨询顾问、父母和他们的同龄人来了解大学的选择,并建立他们的选择集合,然后选择一个他们喜欢的学校就读。大学信息是大学准备度的核心要素。大学信息可以帮助高中生强化高中学习体验,发展对大学身份认同,增加学业投入,并为后续的院校选择和入学做好准备。

一般而言,大学信息主要涵盖学业要求、大学成本、奖励补助、校园活动等维度。研究者对英国中学生的调查发现,在大学选择时考虑到的信息涉及课程内容、学校声誉、院系声誉、校园环境、校园夜生活、学校活动等,而学校的辅助性设施与平台则相对不重要。^[9]Kimura-Walsh等人的研究发现大学知识主要包括关于大学咨询、大学招聘信息和联系、入学前专门准备课程的信息(例如课后、暑期课程),以及有关大学申请、或费用减免、或资助援助信息的研讨会。^[10]

美国在将大学信息的理念落地为可操作的实践层面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其一是部分州推出大学信息评价工具。例如“得克萨斯州大学信息清单”

(Texas College Knowledge Inventory)与“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知识清单”(North Carolina College Knowledge Inventory)。二者均涉及入学要求、学费成本、经济与社会收益、资助和贷款信息,成绩和学分转移等维度。其二是大部分高校推行的特定时间段内的大学知识宣传项目。例如“大学知识日”(College Knowledge Day)和“大学知识月”(College Knowledge Month)(明尼苏达)。^[11]他们认为大学知识不仅仅是简单的大学申请过程,而且是要学会在大学适应和成功的技能与认知。其三,有部分专门面向特定学生群体的科普读物、手机应用与游戏,向准大学生们提供信息介绍。

对于大学信息的探究包含在研究者对大学准备和大学选择行为的考察。^[12]与之对应的英文有“college knowledge”(大学知识)和“college information”(大学信息)。严格意义上,后者从属于前者,但二者有区别。后者一般指客观世界社交传播的一切内容,而前者指人对客观世界系统和高级的认识。^[13]本研究试图将二者进行融合。因此,本研究的“大学信息”即涵盖客观世界,也包括个体对信息的认知加工。与之对应的是,大学信息有“事实”与“特质/属性”两种类型的分野。“大学相关信息”(college-related information)强调学费成本、入学标准、奖助学金(“录取-成本-学习-奖助”)等因素,因而聚焦大学选择过程的事实性陈述。而“大学相关的特质信息”(college-related attribute information)更落实在满足学生心理和认知层面,且该属性对不同主体的心理满足与评价存在差异。已有研究多考察学生对其重要性的评价。

(二)大学信息来源与掌握水平

大学信息来源和掌握水平会影响学生后续的学业行为。既有研究基本认为弱势群体学生及其家庭在大学知识上存在劣势。因为身处劣势,这些弱势学生不仅认为大学信息不重要,^[14]还缺乏与大学相关的信息,更不具备解码信息能力,更重要的是身份标签会强化信息缺乏程度。^[14]

在大学信息来源上,已有研究关注的是学生从何种渠道收集相关的大学信息,以及不同的人群在信息来源渠道上的差异情况。他们发现学校官网、社交媒体、学校职业生涯咨询顾问、父母及亲属、同伴是最主要的大学知识渠道。有的研究发现

学校官网是学生获取大学知识最主要的渠道。人际交往的社会网络也提供了部分信息源,例如同伴、教师、泛泛之交、学校职业指导教师等。^[15]部分研究发现,学校生产的电子资源(官网)和出版物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16]部分研究发现,他们更加喜欢口口相传(word of mouth)的方式,而不是商业信息来源(大学开放日与官网),^[17]因此父母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研究者对加州地区墨西哥裔女性调查发现,父母缺位会使家庭年长子女承担起了大学知识信息源的职责。^[18]

部分研究者观察到不同阶层收集大学信息也存在差异,并在后续发展出“热知识”(hot knowledge)和“冷知识”(cold knowledge)的分野。^[19]前者指的是来自于身边关系网络的小道消息,而后者则来自于学校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息。弱势阶层更青睐于“热知识”,而优势阶层更倾向于“冷知识”。弱势学生基于所接触到的两种知识类型,逐步形成对大学教育的渴望与想象。^[20]后续关于该主题的深挖,研究者认为还存在一种偶然的“泛泛之交”联结带来的信息。他们将其归纳为“暖知识”(warm knowledge)。^[21]尤其是对于那些具有难民身份的弱势学生而言,泛泛之交的“暖知识”甚至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22]

基于“官方-小道消息”划分的冷热知识维度,立足于西方社会“弱关系”的前提,这与中国文化“强关系”更易发挥作用的假设不符。“弱关系”仰赖群体间的强异质性、广分布、阶层大跨度,因而能发挥信息、观念、影响力等方面的传递作用,创造机会。因此,更注重信息而不是人情的西方社会,劣势阶层更倾向于从寻常小道获得信息,而优势阶层仅需从公共渠道便可获得有用信息。与西方弱关系社会不同,中国儒家传统的亲疏文化衍生了强关系,即人们更容易通过亲属朋友实现关系勾连。社会网络的发挥主要通过信息与人情两种机制产生,而且以人情为主、信息为辅。虽然优势阶层更善于收集与使用信息,而劣势群体更倾向使用人情来弥补自身信息不足,^[23]但这不意味着优势群体更喜好“冷信息”或劣势群体更聚焦“热信息”。研究者后续对“找关系入学”的考察中证实人情在社会网络中的重要性,他们以此实现学位资源等核心信息的交换。这也就意味优势阶层集信息与人情优势一身,他们不仅会利用公共信息,也善于通过强关系打听小道消息。^[24]

而劣势群体可能因为关系网络质量低下和高度同质性,不仅无法获得“内部消息”,可能也无法对公共信息进行有效解码。

(三)大学信息实际效果的研究

考生填报志愿近似于不完全信息博弈,拥有更多信息者一般而言会居于相对优势位置。已有研究发现,对于部分群体,大学相关信息缺失(knowledge deficits)与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可能会强化弱势学生的高等教育机会和质量的劣势。^[25]尤为严重的是缺少正确信息的高分考生更可能发生“高分低录现象”。^[26]如果能够给予低阶层学生正确和充足的信息干预,则能显著提升他们申请适合大学的概率,^[27]增加报考高回报专业的倾向,^[28]减弱家庭经济因素对报考重点大学的约束。^[29]信息越匮乏、获取信息越难,信息干预的重要性就越明显。现有的知分填报的博弈过程,在一定程度也导致学生可能出现“考的好不如报的好”的现象。^[30]还有研究者发现,之前已经部分掌握大学信息的学生更有可能在后续继续去搜集相关的大学知识。^[31]最后,作为信息的“大学期望”,研究者也发现那些具有较高大学期望或抱负的学生,姑且不考虑他们前期的信息质量和正确性,他们之后进行信息和知识收集的意愿和能力往往都相对较高,而这可能不仅仅是信息的理性特征,^[32]而是涉及信息的文化特质。

虽然中国的新高考改革正在凸显大学信息的重要性,但不得不考虑的是国内的独有志愿填报、高考录取双重博弈机制以及高中学习环境氛围可能部分限制信息的实际效果。其一,中国的“知分填报”模式^[33]使高考成绩成为学校和专业选择最核心的因素;其二,大学质量分层明显,学生志愿填报基本延续从高到低的顺序。而该特点又与学生的排名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分数的重要性;其三,紧张而又严肃的高中阶段,学生无暇顾及课业外的内容,因而对信息较为全面的掌握和理解可能要推迟到高考前后,甚至对部分学生而言,可能要在高考后才开始了解相关信息。从最严谨的角度来看,上述推论还有待数据进行验证,而且已有研究均在西方背景或是国内未实施新高考改革的时期或地区开展,在已经强化大学信息和准备的新高考国内部分地区,“七分考三分填”趋势会愈加明显,大学信息的实际效果应该进行验证。

总而言之,既有研究不仅在概念方面缺乏严格界定,而且在新高考强化对学生选择和能力要求的背景下,鉴于议题的微观、数据收集难度以及中学-大学衔接整个领域的“思辨”范式,大学信息在国内学界依然是尚未引起重视但足够重要的议题,因而也缺乏系统性考察。^[34]在中国文化强弱关系变化框架下,文化与网络连兼具城市“理性”与农村“人情”特点的县域社会,^[35]大学信息来源是否也呈现“冷与热”的特点也不得而知。与分数相比,大学信息的重要性到底几何?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整合后的“事实”与“特质”的大学信息框架,并致力于解决如下几个重要的子问题:(1)学生的大学信息来源是何种渠道?(2)高三学生对大学信息重要性的评价如何?(3)学生大学信息的掌握水平如何?(4)大学信息水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学生?

三、研究设计

考虑到新高考改革政策在华东地区的梯度推进与实施(共同特征),受访学生生源地与大学驻地变迁(流动性)的双重实际以及三角验证的稳健性,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研究者及团队于2018-2022年在中国东部不同地区的高中、农村、高校所进行的接力与纵向的系统性考察。这些调查涉及研究者于2018-2020年对华东四省(安徽、江西、江苏、山东)四所县中高三学生、家长、教师和村民所进行的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研究团队于2018-2022年对上海某精英大学本科生的半结构访谈,2021-2022年对浙江省某普通高校本科生的半结构访谈、教育自传与焦点小组讨论的结合。在对本科生的访谈中,研究者采用了回溯性评估分析(retrospectively assess)技术,系统考察学生对高中-大学转换过程中完整且细致的记忆经历。在对资料分析中,本研究采用混合分析中的“嵌入式设计模型”(The Embedded Design),也即量化与质性同时开展。在具体呈现上主要以量化研究为主、质性分析为辅,量化与质性研究共同丰富细节和补充说明。问卷共调查3886位学生,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后,进入最终分析的样本为3826。研究者在对四所县中的调查中获得22位受访者信息,在上海某精英大学共访谈10位本科生,在浙江某一本高校共获得20余位本科生访谈、焦点小组资料和个人自传文本。通过专业的

语音转录平台进行文本转化,在经团队成员进行校对之后,最终获得共20余万字的文本内容。

在对大学信息的操作上,研究者借鉴主流文献以“重要性-充足度框架”(importance-sufficient)联合考察大学信息的做法。在聚焦“特质信息”的重要性维度上,问卷中询问学生对学校声望、教师水平、学制时间、住宿条件、图书馆等设施、毕业生找到好工作、花费成本、合适专业、是否大城市、离家距离等学校特质的重要性评估(从“非常不重要”到“非常重要”)。我们采用上述所有信息维度加总后的均值作为学生的信息水平。受到赫兹伯格(Fredrick Herzberg)双因素理论(Motivator-Hygiene Theory)及其在教育选择相关文献应用^[36]的启发,本文也将其划分为激励与保健两个方面。在聚焦“事实信息”的充足度框架上,参考西方文献“录取-成本-学习-奖助”体系^[37]和国内研究者信息干预框架,^[38]问卷询问了学生对招生录取政策(保送生/特长生/自主招生等特殊招生政策、专科升本科政策、贫困地区定向招生政策)、大学录取分数线、志愿填报过程(“录取”);大学费用、本专科费用(“成本”);专科与本科差别、了解在校大学生学习与生活、职业标准条件(“学习”);奖助学金(“奖助”)政策等了解程度(从“非常不了解”到“非常不了解”)。在问卷中,我们还询问了学生了解上述不同信息的具体来源。同时,研究者还在问卷中询问了学生是否具备大学层次需要的语言、思维和逻辑能力的关键认知能力、教育期望、学业表现、班主任评价、学业努力程度、性别、复读经历、民族、户口、普通话水平、独生子女、家庭初代大学生、父母参与(和我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父母背景(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家庭文化资本(独立书桌、藏书量、电脑/网络)、市场化辅导培训等因素。

四、研究发现

(一)大学信息来源渠道的差异

为了考察学生大学信息来源渠道的差异,尤其是与西方文献“冷-热知识”的理论体系对话,研究者考察了学生对大学学习生活知识、招生录取政策、奖学金信息来源的渠道及其家庭差异。如图1所示,研究发现,老师和同学(34.42%)、社交媒体(30.67%)、亲朋好友(15.95)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而大学的官方网站或相应招生宣传手册则成为最不

重要的渠道。对于大学招录政策与奖助学金信息(见图2),研究者同样发现高中学校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渠道,其次是新闻媒体。作为对比可以发现,在政策方面,学生对学校信息渠道倚重得更多。而父母教育似乎在政策与大学信息来源方面都不占主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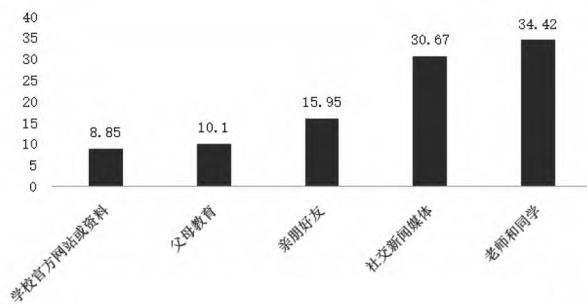


图1 大学学习生活信息来源渠道
(基于回答次数百分比,多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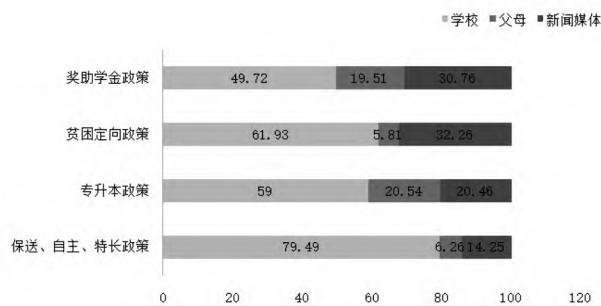


图2 学生招录政策、奖助学金信息来源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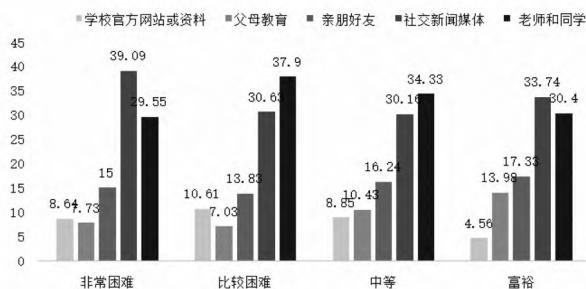


图3 不同收入家庭学生大学信息来源差异(%,基于首选项)

基于家庭收入视角考察发现(见图3),虽然老师和同学、社交媒体是所有收入家庭的最主要信息来源,然而考虑了高三学生学业为主和县中学校的实际角色,我们发现,在学校官网或资料、父母教育、亲朋好友三种信息源上,不同收入家庭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低收入(8.64% /10.61% VS. 4.56%)家庭更倚重学校官方网站或资料,而高

收入家庭在父母教育(13.98%VS. 7.73%)和亲朋好友(17.33%VS.13.83%)上的倚重程度更为明显。就算是单独考察老师同学与社交新闻媒体两大主要信息渠道,也可发现非常困难家庭学生对社交新闻媒体的依赖程度更高,中等收入家庭更依赖老师和同学,富裕家庭在二者之间的差异较小。基于家庭访谈也发现,家长在得知高考分数后步行去询问县城的远方亲戚却遭遇亲友冷漠和敷衍了事。自身关系网络的同质性和低质量,以及与亲友关系的生疏以及居住距离的疏远,综合减弱了强关系带给低收入家庭的效用,他们只能转向公共信息渠道。

换言之,无论是否考虑了社交媒体与老师同学因素,结合质性资料的多项证据均表明,低收入家庭更倾向于从学校官网或资料等弱关系寻求信息,而高收入家庭从倾向从父母和亲朋好友等强关系寻求信息支持或帮助。这与西方社会中的“冷-热知识”分类是截然不同的,并且体现出中国社会强关系网络在社会互动与合作中嵌入式运行的现实特点。

(二)学生对大学信息(特质性)重要性的评价

图4呈现的是学生对不同维度特质信息重要性的认知程度。研究发现,合适的专业、毕业生找到好工作、教师水平、图书馆等设施、学校声望等指标是学生进行大学选择时最看重的信息。而离家的距离、是否大城市、花费成本、学制时间等信息是学生最不看重的维度。也即学生更看重激励信息,相对不那么倚重如成本和距离等保健信息。该发现中的花费成本和离家距离与西方文献中学生看重成本和离家距离有所差异。进一步从家庭收入视角考察不同家庭在对特质信息重要性评价的差异。如图5所示,研究发现,在学校声望、住宿条件、是否大城市等指标上更明确呈现出家庭收入越高学生的评价也越高的趋势;而在花费成本、离家距离等维度上更为清晰地呈现出家境越优渥的学生其重要性评价越低的趋势。相比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学生可能更看重大学成本与大学离家距离等因素对自身的限制。

(三)学生对大学信息(事实性)的掌握水平

基于“录取-成本-学习-奖助”信息的事实型框架,研究者考察了学生在不同信息维度的掌握水平(将五点计分转换成百分制),以及不同收入家庭的差异。如图6所示,研究发现,学生对“录取”环节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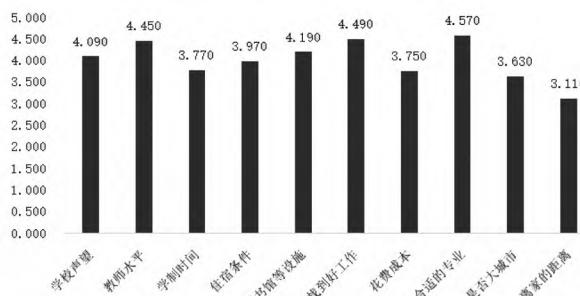


图4 学生对不同维度特质信息重要性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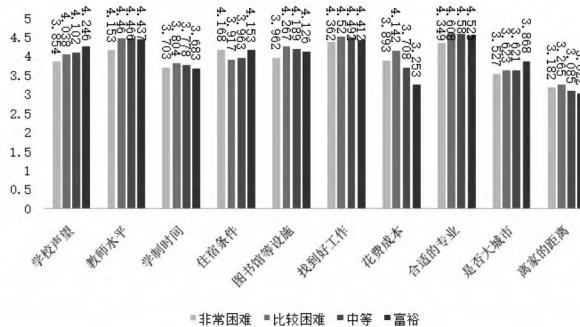


图5 不同收入家庭学生对特质性重要性的评价

的特殊招生类型(贫困定向、专升本、特殊招生)知晓程度最为薄弱,对奖学金信息掌握也相对薄弱,对志愿填报过程的掌握也相对较弱。较为讶异的是,在以“本专科差别、大学学习生活、职业标准条件”为代表的“学习”维度,学生的信息掌握程度表现较优。具体而言,学生对青睐学校所需的分数线了解程度在所有指标中表现最佳,其次是对专科与本科差别的了解,再次之是对自己感兴趣的准入条件的掌握程度。最后,研究者还以学生填写大学名称与专业是否空白来考察学生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将学生分为专业缺失类、学校缺失类、专业和学校都缺失类、专业和学校都不缺失类等。研究发现,有一半以上(50.84%)学生属于“学校-专业缺失类”,15%学生属于专业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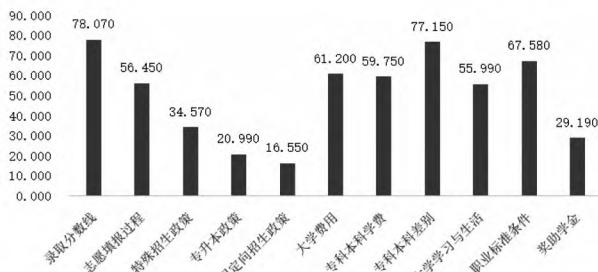


图6 学生对不同大学信息掌握程度

类,12%左右学生属于学校缺失类。

研究团队在对县中周边陪读家长的访谈中也发现,经济困难的家庭对大学相关的认识基本空白。他们用仅有的对“清华北大”的认知向我们展示大学的重要性时,“清华大学”还被他们误读为“新华大学”。哪怕是家境稍好的农村家庭,他们也坦承“学习上的事情我们没办法……自己只能给孩子提供学费和生活费,其他的孩子和自己都不懂”。但相较而言,这种极度信息缺失似乎在没有实施新高考改革的江西与安徽两省更明显,而在江苏和山东两地较少见。例如有学生反映,“排名对应什么学校分数线,(我们)基本不了解,对大学了解也不多,只知道南昌大学。在湖南,知道中南,当时连上海交大都不知道,剩下的只知道清华北大。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600多分是什么概念完全不知道,在看了报考的书之后,才知道学校和专业。”

研究者以家庭收入维度继续考察发现(见图7),几乎所有指标均呈现出家庭收入越高信息掌握水平越好的趋势。而且该趋势在“录取”“学习”“奖学金”等维度上的表现更为清晰,而在“成本”维度上表现并不明显。这可能与低收入群体在面对成本约束时敏感度并不比高收入家庭低,因而弥合了与高收入家庭对成本信息的掌握鸿沟。质性材料中大学专业和名称的信息缺失,似乎指向新高考改革本身会带来“水涨船高”效应,即低阶层家庭也会受益于信息溢出进而提升信息水平。所以,研究者进一步考察新高考和传统高考两地阶层信息水平的差异。研究发现(见图8),相对于传统地区,面临新高考的县中低阶层学生的信息水平会显著较高,且与高阶层间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例如:志愿填报过程、贫困定向招生政策、大学费用、大学学习生活、奖学金尤其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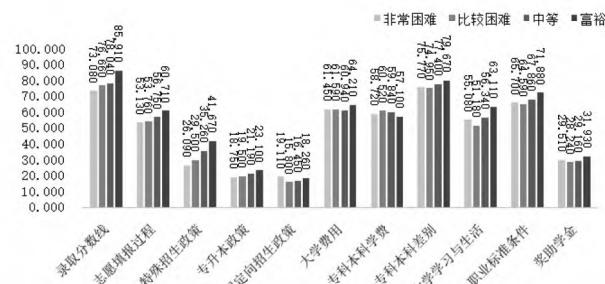


图7 不同收入家庭学生大学信息掌握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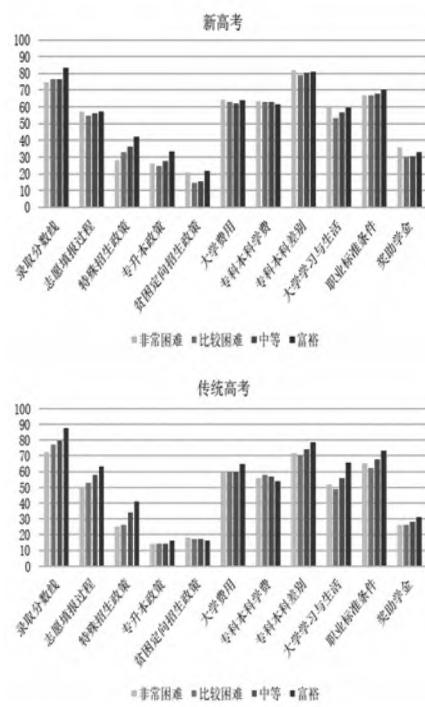


图8 不同收入家庭学生大学信息掌握程度
(新/旧高考省份)

(四)大学信息在实际中到底有多大效用

为了考察大学信息到底在何种程度上会影响学生从高中进入大学的全过程,本研究将从高考前夕、考入大学与大学期间三个阶段分别考察大学信息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具体而言,在高考前夕,我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技术考察以语文和数学作为代理变量的关键认知能力、教育期望。在考入大学和在校期间,我们采用质性资料探索大学信息对顺利考入大学和顺利适应与发展的实际效果。

在量化结果部分,我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技术考察学生大学信息掌握水平(事实性)对学生发展的影响。由于学界对大学信息掌握水平的衡量并没有系统的框架,所以研究者将“录取-成本-学习-奖助”框架下的所有指标进行加总获得大学信息掌握水平的代理变量。再者,由于不同学校存在无法被完全观测到的文化和情境性的差异,所以研究者以固定效应和稳健标准误技术试图消除学校间难以观测到的差异。为便于分析,研究者将信息来源分为强关系(老师同学、亲朋好友、父母教育)和弱关系(学校官网和资料、社交媒体)。基于保健和激励维度均值的比较,确定保健性决策者和激励性决策者两类学生。结果如表所示。研究发现,大学信

息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关键认知能力和教育期望。具体而言,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信息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关键认知能力将提高0.838个单位,教育期望提高0.057年。考察影响的异质性后进而发现,在教育期望维度上,大学信息水平的提高对城市学生的影响更为明显。这可能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城镇学生成绩更为优秀,家庭更具有文化资本,他们更愿意和有精力花费在信息搜集上;其二,城镇学生和家庭对信息更加高效和积极的编码能力。而在关键认知能力上没有发现异质性。

大学信息对学生成长的影响(认知能力与教育期望)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关键认知能力	关键认知能力	教育期望	教育期望
大学信息水平	0.838*** (0.053)	0.821*** (0.088)	0.057*** (0.010)	0.092*** (0.016)
农村	0.231 (0.551)	-0.462 (3.038)	-0.038 (0.128)	1.429** (0.564)
信息水平*农村	- (0.106)	0.025 (0.025)	- (0.053** (0.020))	-0.053** (0.020)
大学信息来源	0.174 (0.507)	0.174 (0.507)	-0.086 (0.117)	-0.086 (0.117)
决策类型	-1.806** (0.758)	-1.815 (0.759)	0.342 (0.162)	0.360** (0.16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学校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826	3826	3826	3826
拟合度	0.293	0.293	0.149	0.150

注:(1)控制变量:学业表现、班主任评价、学业努力程度、性别、复读经历、民族、户口、普通话水平、独生子女、家庭初代大学生、父母参与、父母背景、家庭文化资本、市场化辅导培训等变量;(2)括号中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3)*** p<0.01, ** p<0.05, * p<0.1

在质性部分,我们在已有学生基础上转而重点关注“高分低录”、专业低满意度、转专业等类型学生。研究发现,学生认可以成绩为基础的志愿填报是最关键的要素,但随着录取过程复杂和多元招生政策产生,他们认为信息扮演“参考”的重要性也在逐渐提高。正是因为学生或父母在志愿填报前对大学学习生活、特殊招生政策(例如三位一体、定向等)、大学行话(university jargon, 例如综合测评制度和体测)等信息的不了解或误解,部分限制了他们大学期间的参与、兴趣、适应和规划。正如有些学生反馈:“因为没有事先了解(专业和学校),很怕节肢动物的我,做了很大的心理建设才修完了动物学实验的课程……这一切都是因为预先了解的不足,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我都处在后悔之中(生物)。”“我拿着可以去省外211的分数进了这样的专业……现在我妈也会和我说她也后悔,她觉得把我送进这个专

业是不是葬送了我，如果当初我们对专业的了解，对就业行情了解再多一点点，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呢？（学前）“在填志愿前了解有关大学、专业等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些了解程度在某种意义上会决定自己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突然发现高中毕业后自己其实可以更多的选择”。“除了对大学、专业排名、师资水平等与学业直接相关的信息，一些被热门搜索遮盖住的信息也值得我们去收集和比较。例如学年体测的项目以及具体标准、‘校园跑’要求等。举与体育相关例子的原因，主要是我本人目前是这些‘不起眼信息’的‘受害者’。”（中文）

最后需提及的是，虽然信息水平对城市学生期望影响更大，但这种影响对农村学生依然是正向的。这一发现验证了我们对信息的“文化特质”的猜想。换言之，信息搜集和解读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文化和心理行为”，类似于一种与大学目标自我靠近的过程。对于其他学生而言，有效地了解大学信息不仅能够帮助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后很好适应；更重要的是，这种浸入到大学信息的过程，可以调节紧张的学习氛围，提升自身大学期望和大学准备度，调整学习进度和实际目标。

五、结论、讨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新高考制度改革推进，大学升学制度的复杂程度考验着学生及家庭的信息搜集与准备能力，“昂贵的大学信息”还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鸿沟。然而，国内却尚未对学生大学信息主题进行系统研究。借鉴混合研究的思路和整合的大学信息框架，研究者对华东地区县中学生、家长、教师、在校大学生进行综合性的连续考察，研究发现，大学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是社交新闻媒体和老师同学、亲朋好友。低收入家庭更依赖以学校官方网站或资料与社交新闻媒体为代表的弱关系，高收入家庭更依赖老师和同学、父母教育、亲朋好友等强关系，学生大学选择看重专业、就业、教师水平等激励信息。他们对招录过程的特殊招生政策、奖助学金等信息知晓水平较差，其中弱势群体的劣势更为明显。虽然成绩依然是决定学生能否进入大学的核心要素，但大学信息水平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语文和数学关键认知能力和教育期望，尤其是对城市学生的教育期望影响更大。作为准备行为和心理投入的信息也会对

后续的大学适应与参与提供积极影响。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研究的贡献有如下几点：第一，本研究首次从“特质(重要性)-事实(程度)”框架，系统考察了中国县中学生大学信息议题，有力推动大学信息本土化和理论提炼。例如本研究的大学信息涵盖了客观知识与主观认知两层实质内容。第二，与西方社会强调学校生涯咨询师(school counselor)扮演信息中介角色^[39]不同的是，县中缺乏规范的职业生涯专职教师，但中国情境文化衍生了以县中为焦点的文化核心。作为区域知识集散中心内的高中与学生及家庭营造出积极的教育氛围。尤其是那些成绩优异的平民学生及家庭，他们通过教师和同学的关系网络获得部分优质和丰富大学信息。^[40]第三，在承认县中对所有学生的信息托底作用，本研究发现西方的“冷-热”理论框架并不适合中国情境，在强关系社会下，优势阶层似乎能够“冷-热”通吃，而弱势群体更依赖冷知识。如来自上海精英大学X高校社会学教授的做法足以说明优势阶层的信息解码能力。他在孩子出生后旋即去查当年上海市人口出生率，进而判断其未来高考竞争程度。同时，优势阶层进行信息搜集中背后的人情社会的“关系”负面影响依然值得关注。第四，相对于没有实施改革的省份，新高考改革将部分与大学相关的基础信息提前和全方位地推送给所有学生，一定程度弥补了弱势高三学生的阶层信息劣势，但大量信息的冲击也将信息鸿沟从入口(access)推向质量与编码层面。在专业和院校等信息渠道已经大众化之后，如何更合进行将志愿、学校配合发挥最大效应才是真正的信息鸿沟。第五，虽然信息解码不是本文核心，但我们通过信息对期望的影响异质性考察，间接证实弱势群体对公共信息的搜集和解码的时间精力、能力均匮乏。这可能也是信息会进一步加剧高等教育机会阶层鸿沟的关键因素。

提高县中高三学生的大学信息水平，相应政策实践值得落实。其一，政府、大学与高中合作推动高中-大学衔接过程中的信息标准框架。例如中国台湾地区多元入学方案实施以来推行的“高三升學輔導實施計畫”，以及治理“生涯顾问”的新型职业的系列举措。加强对高中生涯教育内容改革，^[41]应组织多方力量编写高中生应知应会“大学信息目录”或宣传手册，在不增加额外负担前提下，将部分顶尖高

校(例如浙大)实施的大一新生“学生手册考试”引入高中,将学校层面大学信息支持纳入普通高中评价指标体系。作为补充性政策,政府应集中治理混乱和良莠不齐的“大学升学规划师”市场。其二,多主体助力弱势家庭学生不仅能够接触到有效信息,而且还需对“弱关系-冷信息”有解码-译码能力。虽然也有针对性新高考改革政策配套的信息解释与支持,但新信息披露的越多越会加剧阶层的信息鸿沟。政府、高校、研究所应该资助学术界采用一些实验手段^[42]探索公共信息如何更容易被弱势阶层获取和解码。其三,推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融合,加大投入对新高考改革下家庭学生大学选择、信息、准备、对新高考制度的主观评价、决策过程、信息传导路径等微观行为的研究,并以研究成果指导相关实践。例如消费心理学中对顾客购买商品的过程模型,以及其中内部信息搜索和外部信息搜索的理论框架等以及编码解码理论等。其四,呼吁帮助学生实现将大学信息向大学知识的转变,利用他们自身的知识存储体系(funds of knowledge),^[43]建立基于学生-家庭-社区的大学信息干预措施。人们担忧的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现象可能存在合理性,但本

研究结论从侧面拒绝了该种推测。换言之,与其说是信息过载,倒不如说是弱势家庭在面对信息过程中缺乏信息的编码与加工能力。

当然,本研究关于大学信息的分类仍有商榷之处。首先,本研究对于信息来源的设计尽管已经考虑了绝大多数主体,但仍忽略了部分信息渠道,后续研究中研究者将借鉴Brent Goff等人的思路,^[44]从更细致维度考察学生信息来源的差异。考虑到县中教育生态的独特性,未来还需进一步考察城市或精英学生及家庭的大学信息议题。再者,关于“冷热”信息框架的完善还需后续研究进一步深入考察强关系背景下的阶层差异和实际效果的探讨。最后,后续可以从录取结果和质量的直接角度来看大学信息的实际效果,但这也依赖更微观的信息干预和更为昂贵的实验介入,以及涉及学术伦理层面的严峻挑战。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2022年度一般规划课题“‘加强县域高中建设’背景下高三学生的学业投入研究——基于浙江省‘山区26县’的实证考察”(2022SCG010)的阶段性成果。吴秋翔系本文通讯作者。

(责任编辑 翁伟斌)

注释

①相关链接：<https://sites.google.com/view/minnesotagoestocollege/initiatives/college-knowledge-month>。

参考文献

- [1][法]迪迪埃·埃里蓬. 回归故里[M],王献,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07:127.
- [2]葉馥. 多元入學作為階級過程：學校組織介入與階級不平等[D].台湾大学,2016.
- [3]Kim, J. K., & Gasman, M. In search of a “good college”: Decisions and Determinations behind Asian American Students’ College Choice[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2011,52(6), 706–728.
- [4]Dana Goldstein & Jack Healy. Inside the Pricey, Totally Legal World of College Consultants <https://www.nytimes.com/2019/03/13/us/admissions-cheating-scandal-consultants.html>.
- [5]McDonough, P.M., Lising, A., Walpole, A.M. et al. College Rankings: Democratized College Knowledge for Whom? [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1998, 39, 513–537.
- [6]魏建国,罗朴尚,宋映泉. 高中学生对大学成本和学生资助信息的知晓状况分析——基于对我国西部41个贫困县的调研[J]. 教育发展研究, 2011(21):7–13.
- [7]鲍威,金红昊,肖阳. 阶层壁垒与信息鸿沟:新高考改革背景之下的升学信息支持[J]. 中国高教究, 2019(05):39–48.
- [8]林小英,杨蕊辰,范杰. 被抽空的县级中学——县域教育生态的困境与突破 [J]. 文化纵横, 2019(6):100–108.
- [9]Veloutsou, Cleopatra, John W. Lewis, and Robert A. Paton. University Selection: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and Importa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2004, 18 (3): 160–171
- [10]Kimura-Walsh, E., Yamamura, E. K., Griffin, K. A., & Allen, W. Achieving the College Dream? Examining Disparities in Access to College Information Among High Achieving and Non-High Achieving Latina Students[J]. Journal of Hispanic Higher Education, 2009 8(3):298–315.

- [11]汪卫平.父母学业参与对子女大学准备度的影响——基于华东四省四所县中高三学生的调查[J].教育经济评论,2021,6(04):85–106.
- [12]Braf, E. Knowledge or Information[M]. Liu, K., Clarke, R.J., Andersen, P.B., Stamper, R.K., Abou-Zeid, ES. (eds) Organizational Semiotics. IFIP –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Boston, MA: Springer, 2002, 94:71–90.
- [13]Menon, Maria Eliophotoul, Anna Saiti, and Michalis Socratous. Rationality, Information Search, and Choice in Higher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Greece[J]. Higher Education, 2007, 54,5: 705–721.
- [14]Huerta, A. H., McDonough, P. M., Venegas, K. M., & Allen, W. R. College Is . . . : Focusing on the College Knowledge of Gang-Associated Latino Young Men[J]. Urban Education, 2020;1–30.
- [15]Simões, Cláudia, and Ana Maria Soares. Applying to Higher Education: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Choice Factors. [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0, 35,4: 371–89.
- [16]Jürer Erdil, D., Tümer, M., Nadiri, H. & Aghaei, I. Prioritizing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Requirements in Students' Choice of Higher Education Destination: Using AHP Analysis[J]. SAGE Open, 2021:1–15.
- [17]Le T D, Robinson L J, Dobele A R. Understand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use of Choice Factors and Word-of-mouth Information Sources in University Selection[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9:1–11.
- [18]Ceja, M.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Parents and Siblings as Information Sources in the College Choice Process of Chicana Students[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2006,47(1), 87–104.
- [19]Ball, S. J., & Vincent, C. "I Heard It on the Grapevine": "Hot" Knowledge and School Choice[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8, 19(3), 377–400.
- [20]Lisa Smith. Experiential 'hot' knowledge and its Influence on Low-SES Students' capacities to Aspire to Higher Education[J]. Critical Studies in Education, 2011,52(2):165–177.
- [21]K. Slack, J. Mangan, A. Hughes & P. Davies. 'Hot', 'cold' and 'warm' inform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decision-making[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4, 35,2: 204–223
- [22]Sally Baker, Georgina Ramsay, Evonne Irwin, Lauren Miles. 'Hot', 'Cold' and 'Warm' Supports: Towards Theorising where Refugee Students go for Assistance at University[J].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2018, 23(1): 1–16.
- [23]边燕杰,缪晓雷.如何解释“关系”作用的上升趋势? [J].社会学评论,2020,8(01):3–19.
- [24]阮极.人情对贿赂及其“道德化”的影响——基于找关系入学的民族志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8,33(02):189–213
- [25]Perna, L. W.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about College Prices and Financial aid and Students' College-related Behaviors[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6,49(12), 1620–1635.
- [26]陈思,丁延庆,刘霄,等.农村学生“高分低录”的现象及原因——基于宁夏高考数据的分析[J].教育经济评论,2018,3(02):52–80.
- [27]Ehlert, M., Finger, C., Rusconi, A., & Solga, H. Applying to College: Do Information Deficits Lower the Likelihood of College-eligible Students from Less-privileged Families to Pursue their College Intentions? [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7,67, 193–212.
- [28]丁延庆,杜立珍,李伟,伍银多,杨晋,叶晓阳.信息干预对高考志愿专业选择的影响——来自大规模随机实验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 2021,21(06):2239–2262.
- [29]崔盛,吴秋翔.家庭经济条件还是学生能力?——信息干预对农村学生选择重点大学的影响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39(02): 102–110.
- [30]聂海峰.考得好不如报得好么?——高考志愿填报博弈研究[J].南方经济,2007(07):23–36.
- [31]Menon, Maria Eliophotoul, Anna Saiti, Michalis Socratous. Rationality, Information Search, and Choice in Higher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Greece[J]. Higher Education, 2007, 54,5: 705–21.
- [32]Judy Marquez Kiyama. Family Lessons and Funds of Knowledge: College-Going Paths in Mexican American Families[J]. Journal of Latinos and Education, 2011, 10(1):23–42
- [33]吴斌珍,钟笑寒.高考志愿填报机制与大学招生质量:一个基于择校机制理论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2,11(02):765–804
- [34]谷鹏磊.高考志愿填报相关影响因素的调查报告[J].中国校外教育,2019(01):69.
- [35]冯军旗.中县干部 [D].北京:北京大学,2010.
- [36]Pedraza L, Chen R. Examining Motivator Factors of STEM Undergraduate Persistence through Two-Factor Theory[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22, 93(4): 532–558
- [37]Bell, A. D., Rowan-Kenyon, H. T., & Perna, L. W. College Knowledge of 9th and 11th Grade Students: Variation by School and State Context[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09, 80(6), 663–685.
- [38]崔盛,吴秋翔.资助信息对农村学生选择重点大学的影响——基于高校专项计划的随机实地实验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58(01):157–166.
- [39]Robinson, K.J., Roksa, J. Counselors, Information, and High School College-Going Culture: Inequalities in the College Application Process

- [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2016, 57:845–868 (2016).
- [40]李金刚.会宁教育:一个“教育状元县”的时空社会学考察[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20.
- [41]崔海丽,朱红,马莉萍.高中生涯教育对学生未来规划清晰程度的影响——以强基新生为考察对象[J].教育发展研究,2022,42(10):67-76.
- [42]Wiswall, M., & Zafar, B. Determinants of College Major Choice: Identification using an Information Experiment[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5, 82(2), 791–824.
- [43]Kiyama, J. M. College Aspirations and Limitations: The Role of Educational Ideologies and Funds of Knowledge in Mexican American Families[J].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10, 47(2), 330–356.
- [44]Brent Goff, Vanessa Patino & Gary Jackson. Preferred Information Source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for Communi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J]. Community College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04,28(10): 795–803

The Sources, Levels, and Usefulness of College Information

A Field Study Based on "County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Eastern China

Wang Weiping,Wu Qiuxiang & Zheng Yajun

(School of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 School of Edu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School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College information can help high school seniors, especially high achievers, cope with the complex college admissions process. Existing research not only lacks rigorous conceptual framework, but also lacks examin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Based on an integrated conceptual framework, this study conducted a joint examination in East China in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students' level of college information, sour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main channels of college information sources were social news media, teachers, peers. Low-income families relied more on weak relationships represented by school websites and social news media. High-income families relied more on strong relationships represented by teachers, classmates and family. Students' college choices are more dependent on motivational information such as majors, employment, and faculty quality. Students, especially low-income groups, have relatively poor levels of knowledge about special admissions policies, scholarships, and other recruitment process. College inform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students' key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education expectation, but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urban students.

Keywords: college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sources, "county high school" students, strong-weak relationship, New Gaokao reform